

在变身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北京以摊大饼的形式不断向外扩展,出行难、看病难、房价高等城市病灶不断升级;放眼全国,为了给发展腾出空间,大多城市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做一次又一次的取舍——历史不断消失的速度并没有减缓,卫星城的建立并没有带来根本的行政功能分化,“上下班堵车,回家睡觉”成为大城市的常态。我们在失去一座座古城的同时,也失去了一座座新城。困局中,有人未曾停止思考。近期,有两本与城市规划有关的文集问世,一为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军所著《历史的缺口》,另一本是南京大学政治学教师姚远所写《城市的自觉》。两位作者的共同点很多:他们因对一座城市的感情,呼吁合理的城市规划;他们为古城拆迁按下慢进键,为古城风貌的保存翻过史料抄过档案;他们虽然都不是城市规划领域的科班出身,但历经多年的积累都变成了“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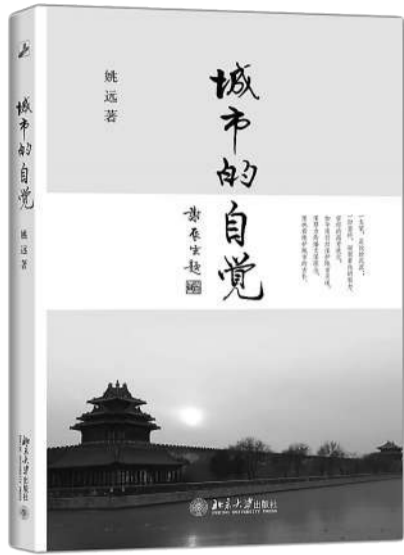
### 王军:改变拆迁经济,借鉴不动产税制度

王军供职于新华社《瞭望》周刊,早年被分配跑城建口,从此他的写作就和城市建设紧密相连。在大量采访和资料整理后,他作品不断:记录北京历史与现状的《城记》,探讨城市规划误区的《采访本上的城市》,聚焦新世纪北京规划发展的《十年》,从老房子的消失到如何构建宜居城市,从微观到宏观,王军的记录与思考循序渐近。

他想借新书《历史的缺口》探讨更大的命题。不再像过去的作品以讲故事为主,书中围绕城市建设展开的9篇文章更富学术色彩:圆明园被焚

毁时的历史,1950年代梁思成与陈占祥在北京西郊设立行政中心的规划方案,城市化转型中土地制度的思考,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对大北京未来的探讨……王军告诉青阅读记者,他希望上升到公私关系的讨论中,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土地使用者的财产权之间的讨论。在他看来,这是城市化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国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必须面对的话题”。相较于“土地财政”引发“拆迁经济”的恶性循环,他认为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以不动产税为核心的财产税制度,进入“公共服务投入—不动产增值—不动产增加—政府进行更多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

# 为两座古城写下“药方”



诚然,上升到学术层面的文章,并不像讲故事的书那么好读,其中的部分观点对于百姓而言,距离较远。早前的一个周末,王军在国家图书馆做讲座,结合北京将建立“副行政中心”的规划方向,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一个从通州赶来的年轻人向王军提问,知道了城市发展的困局后,宜人城市的愿景如何实现?年轻人应该怎样做?王军回答说,应保持建设性的态度,在公共

事务中运用理性,而不是运用情绪。

### 姚远:古城保护需要居民的自觉和参与

南京大学教师姚远是一位古城保护的志愿者。2006年、2008年,南京老城两度陷入拆迁危机时,他两度撰文,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南京旧城区。在他的努力之下,2010年后,《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先后施行,从制度上终结了对老城的大拆大建。《城市的自觉》集结了姚远在多家媒体上的文章。这个80后告诉青阅读记者,他并不认为老城保护是向历史开倒车,“我们这代年轻人走出去看到世界后,愈加感觉到,保护老城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在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在呼吁税制改革的同时,他认为,要行之有效地保护文化遗产,就必须将旧城改造中旧的拆迁模式,转变为以修缮为基础的渐进模式,使之成为朝向住房改善、社区整治、老城复兴的“都市再生”的过程。

“老城区的整治,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下,以居民为主体,通过社区互助的‘自我修缮’的方式来实施,将‘旧城改造’从拆迁模式下的行政关系,转变为修缮模式下的民事关系。”姚远认为,居民的自觉和参与是保护古城不可或缺的力量。“北京的烟袋斜街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它现在的商业气氛浓了些,但政府没有拆迁,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后,百姓自己参与修缮与保护。对一个城市而言,政府应当做好公众服务;对于历史街区,政府做好规划保护的引导,剩下的应当交由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来做。”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 简繁宣布封笔,揭秘“美术江湖”伤人伤己

7月21日,“国宝艺术家”刘海粟生前唯一的研究员、画家简繁携新书《沧海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座谈,这是继他15年前揭露艺术圈秘闻的《沧海》三部曲后,又一部充满黑幕的“私人美术史”。

一切可以追溯到简繁与刘海粟的初次见面。刘海粟教导他“去画你自己”。这位国画大师生前

简繁印象深刻。为写这部上百万字的传记,简繁听从师命录制了一百多盘磁带,从儿时经历、与徐悲鸿之间的恩怨,谈到他晚年的落魄失意。在《沧海》中被剥去“衣服”的不止刘海粟一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几乎被简繁得罪了个遍。因为下笔毫不留情,简繁笑称自己已落得“众叛亲离”。出版社和简繁迫于徐悲鸿、刘海粟亲朋的压

力,将《沧海》三部曲修订为两卷本。

今年的新书《沧海之后》或许将掀起新一轮风波。简繁将目光投向自己在美国唯一的圈内好友与合作者——画家丁绍光,企图呈现他和陈丹青、范增、史国良等中国艺术家在海外挣扎不堪的生存状态。简繁认为,与他们相比,一心求名的刘海粟反倒成了一面镜子,一个甘愿为理想付出一切的先行者。当代画家的纷争、冲突,仅仅是为了追逐金钱利益,艺术圈不过是个精致的名利场。“丁绍光是一个符号。他代表艺术怎么跟市场结合,艺术家怎么能够使自己富有,而且产生影响力。”他希望艺术家能以此为鉴,更希望丁绍光能够“悬崖勒马”。

62岁的简繁在现场多次提到“死”。这位故

体语言僵硬、容易激动的老者说,自己写完这两部书已经死而无憾了,“一个人如果死了,任何人对你的评价都毫无意义了,任何人说你好、坏都不重要了。”在他看来,写作挖掘出了“人”的价值,能够企及绘画不能实现的永恒。他不会因任何人笔下有碍。

简繁坦言,写作绝非乐事。被书写对象愤恨不平,写作者同样自伤三分。他在书中追溯亲情冷暖、算计背叛,也不掩饰自己的不平、嫉妒、好色。简繁感慨,不论是回首往事,或是秉笔直书,都令他感到痛苦,甚至通宵失眠,难以排解。完成《沧海之后》,他决意就此封笔。“不管对人还是艺术,写作中我已经倾我所有了。”

言语间,简繁眼神游离,像陷入沉思,也像在面面对不存在的倾听者讲述。讲到忘情处,他自顾自发出爽朗的笑声,但是并未感染到太多听众。封笔后,简繁打算好好陪伴女儿,并继续水墨创作。“余生我想活得快乐一点。绘画让我快乐。”他称将不再与世人打交道,但最后还是补充道,如果丁绍光看过《沧海之后》能够接纳自己,他还会珍惜这个唯一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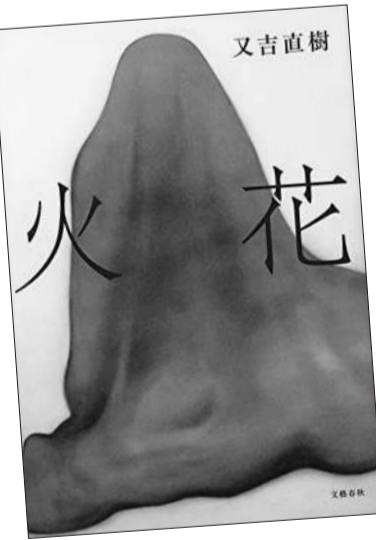
他曾说过,自己家中的座机一年接听和打出的电话只有个位数。

文并供图/张楚楚

## 搞笑艺人赢得芥川文学奖 畅销超过村上春树

7月16日夜,第153届芥川奖、直木奖评选委员会宣布,搞笑组合PEACE成员又吉直树以处女作《火花》获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曾三度入围芥川奖的小说家羽田圭介(1985年出生)。直木奖得主是东山彰良,作品为《流》。芥川奖是日本纯文学的最高奖,又吉获奖打破了芥川奖80年来只有作家入选的纪录,成为近一周日本娱乐圈头条。著名艺人北野武对新闻报道使劲强调“搞笑艺人获奖”表示不满,评委则表示,并未考虑过候选者的职业。而获奖后的又吉表示,仍将继续搞笑艺人的事业。

又吉直树1980年出生于大阪。中学时代开始喜欢读大宰治、芥川龙之介、古井由吉、京极夏彦的小说,1999年进入位于



东京的吉本综合艺术学院,2003年与同期同学绫部佑二结成搞笑组合PEACE,在登台演出、主持节目之余,陆续写过一些随笔、书评等,《火花》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作品描写一个不走红的艺人德永,以接受为前辈神谷写传记为条件,被收为弟子。德永受到天才神谷的吸引,神谷也慢慢向德永敞开心扉,打算向他传授笑的哲学……小说今年三月出版单行本,起印10万册,好评不断,加印不停,到7月16日已累计发行64万册。又吉获奖的消息公布之后,出版方文艺春秋马上决定再加印40万部,然而7月18日开始的长周末三连休之后,全国书店均告售罄,7月21日再次加印20万部。目前《火花》累计发数已达124万册,作为新人作品,超过了文艺春秋2013年推出村上春树作品《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105万册的纪录。

旅居日本的中国作家毛丹青在微博中评价:半年前第一时间阅读《火花》时,觉得这本小说超强,故事很漂亮。他还透露,根据电视剧《情热大陆》的报道,《火花》背后有一位31岁的女编辑,鼓励作者5年,多次改稿让故事升华。此外,该书的内地版权,据称早已售出。

文并供图/小米

## “艺二代”的烦恼

7月18日,艺术家蔡国强出现在爱琴海单向空间。前一天,他才从澳洲赶到北京,此行目的单纯——给一位作家的新书捧场。

蔡国强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当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在城市夜空的火药爆炸表演。此次活动的海报上,他站在一个爆炸装置前,一个小姑娘好奇地看着他。女孩叫蔡文悠,是蔡国强的女儿,生于1989年的她是这场新书沙龙的主人公,在名为《可不可以不艺术》的随笔中,她写了父亲和自己的故事。如书名所言,当中也包含了这位“艺二代”在父亲的影响之下慢慢成长的故事。

蔡文悠生于东京,长于纽约。“父母带我去全世界的美术馆,就这样长大。”就像大家讨论“富二代”时,会谈年轻人和财富的关系一样,这位“艺二代”也在反思自己和艺术、和父亲的关系。“每次作业跟爸爸讨论,他就会提出各种想法,我完全不想接受。我有自己的想法。”蔡文悠说,这是她成长的烦恼。书中更多的是她攻读雕塑专业时的思考,“就像那些火药创作、焰火表演,我也是爸爸的一件艺术作品。如今,在这件作品上面,我努力署下自己的名字。”蔡文悠写道。

看到女儿的作品,蔡国强很欣慰,他还记得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拿着一张纸,学着粉丝的样子问他讨签名。“到今天,她已经可以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很希望以后跟在你的后面,远远的。问你,文悠也给我签名一下,好吗?”蔡国强望着女儿说。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 高校纷纷建“智库”

近年来,高校纷纷建立各个区域语言的“研究中心”,一幅百舸争流的热潮景象。今年4月中旬,“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6月底,“希腊研究中心”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揭牌。高校投资建设这些“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它们是传统学科的改头换面,还是有所拓展乃至要成为“智库”以备“资政”之用?青阅读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告诉青阅读记者,西方的斯拉夫学研究中心已有近千家,出版物达数万种之多,而中国时至今日才成立了首家中心。所谓的“斯拉夫学”,于18至19世纪之交形成,其研究涵盖各斯拉夫国家的文学、语言、艺术、哲学、历史、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甚至科学等,是一门极具包容性和交叉性的学科。

说起缘何在首师大成立斯拉夫研究中心,刘文飞认为主要是出于以下三点考量。一是为了响应

中央关于建立高端智库的学术战略部署,聚合国内外斯拉夫学者,强化学科交流和融合,为国家对外交流和战略研究提供学术咨询;二是加强斯拉夫地区的研究,斯拉夫国家大多分布在东欧,与我国有着悠久、密切的关系,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我们对这一地区的研究相对滞后,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三是因为首师大是国内俄罗斯研究人才较为集中的高校之一,多位著名教授任职于此,俄罗斯研究已成为该校的优势学科之一。

显然,“斯拉夫学”不限于研究俄罗斯,但我国的学术现状能实现其“跨国家、跨民族、跨语种、跨学科”的目的吗?刘文飞表示,目前斯拉夫研究中心均为俄语方向的学者,但未来将着力于培养、引进其他斯拉夫语的人才。另外他介绍说,中心还有一块“副牌”,即“俄罗斯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两者相互呼应、相互补充。斯拉夫中心会涉及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学术领域,而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则

更多地关注于俄罗斯文学——这也一直是斯拉夫学的重中之重。”

“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既是学术机构,也是智库,两者并不矛盾,在欧美大学里往往就是合为一体的。”刘文飞介绍说,中心将向国内外同行开放,计划每年邀请若干杰出的斯拉夫学学者来做研究,并将其成果及时地发布在《北京斯拉夫评论》上。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希腊研究中心”,属该校跨文化研究院的项目,其指向亦是“国家资政的智库”,计划于2017年进入教育部国别研究基地。

据该中心负责人胡继华介绍,成立希腊研究中心,首先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是高校科研组织方式和研究形式的需要。中心的成立有利于培养既具有外语功底又具有专业素养和世界眼光的人才,有利于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走向资政的、服务社会的研究。此外,希腊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交汇点,希腊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和补充。

据悉,二外的希腊研究中心强调关注现实问题,热门课题包括希腊债务、希腊和欧盟的关系、希腊的地缘政治、中国企业在希腊的经营前景等。目前中心以科研简报等形式不断推介国内外希腊研究的成果。胡继华表示,希腊研究中心既要凸显人文精神,又要关注现实问题;既要强化历史意识,又要从历史观照当代政治和文化格局;既要践行跨文化研究方法,又要涵濡中西古今,使高校科研在文化交流、国际事务和政策咨询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高校纷纷上马各类“智库”,不免遭人质疑。要么“有智无库”,专家的成果没人采纳,不能服务于社会;要么“有库无智”,投入大量资金,但缺乏问题意识和整体谋划,最终拿不出具有分量的成果。胡继华教授认为,为避免这两种情况,研究中心应着眼于长远规划,兼顾短期效应,整合研究资源,避免一拥而上,一哄而散。

文/黄兰花